■文化研究

精神产品的喜与忧

□胡为雄

数量和质量：关于进步与发展的考量

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我国的精神产品也丰富起来，各类精神产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文学、文艺戏剧、小说、影视以及网络文学等产品总量空前增加。据2003年的统计数，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其中新版图书110812种），发行157.54亿册，纯销售67.96亿册，人均年消费图书5.23册。出版期刊9074种，29.47亿册；出版报纸2119种，383.12亿份；出版录音制品13333种，录像制品14891种，电子出版物4961种。同时，我国出口图书、报纸、期刊共计766.05万册（份）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32.73万盒（张）。

在自然科学方面，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统计，包括香港地区在内，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上发表的SCI论文总数不断攀升，从1991年的7705篇已增加到2002年的39013篇。按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的世界排名已从第15位跃居到第6位。至2003年，我国的SCI论文总数达到93352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5.1%，仅在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排名居世界第5位。我国被SCI收录的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数，2003年由2002年的24154篇增加到31168篇，被引用次数由51766次增加到72131次，分别增长了29%和39.3%（未排除自我引用或持反对论点和指出论文错误的负面引用）。这个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我国科学界最近十多年内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进入世界文献的数量已有很大的进步，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精神产品生产的巨大进步和精神产品总量的空前增加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这种喜悦多少令人带了些谨慎，甚至其中还有某种巨大的隐忧。为何令人喜中带忧或亦喜亦忧？因为我国精神产品数量的增长虽然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不小。以SCI为例，按2000年的统计数，我国从事R&D的科技人员(大陆部分)人均发表论文0.05篇，而日本人均0.14篇，美国人均0.32篇，澳大利亚人均0.38篇。据2000年所做的世界高校论文数年度排名，哈佛大学为9175篇，台湾大学为2295篇，国立新加坡大学为2124篇，国立汉城大学为2514篇，北京大学（合并后）则为1105篇。

除了数量上的差距外，还有品质上的差距。根据有关资料，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在国际科学引文检索排名中，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前20篇论文中，没有1篇是出自中国科学家之手。在前100篇论文中，中国只有2篇；前1000篇论文中，中国只有14篇。可见，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虽然很快，但真正有影响的论文并不多。也就是说，国人发表的论文中上乘之作较少，有创新突破和原创性成果的较少。

文学、小说类创作也是喜中有忧。喜的是新人新作不断出现，作品数量在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时，一批既具思想魅力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忧的是许多作品格调低下，或宣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腐朽价值观，或过分展示血腥、暴力和色情，这与建设先进文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同时，模仿、克隆甚至抄袭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尽管一些公道人文艺评论能对作品进行分析批评，借以营造文学艺术创作的良好氛围，可是力度不大。这种现象引起普遍的忧虑。以至2003年《新周刊》网站推出《无书可读》专题，对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原创乏力现象以及种种奇技淫巧予以痛斥。这虽然有些偏颇，但也反映了一些读者的激愤心情。

影视类的产品也是数量令人喜，质量令人忧。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从2000年起，我国电视剧集数量急剧增长，平均每天有30集面世。2001年制作的电视剧已多达14429集，可是，当年在电视台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仅2000多集，能够产生效益的电视剧只有15%，其余则持平或亏本。至2002年，制作完成的电视剧仍有9000多集，但真正能上屏幕的精品数量仍然很少，一些渲染凶杀暴力的涉案题材或戏说历史的东西则很时兴。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传达了“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所有电视台黄金时间将不得播放渲染凶杀暴力的涉案题材影视剧”后，相关题材才开始大幅减少。



由于各类精神产品质量欠佳，我国对外贸易存在较大逆差。2003年我国进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用汇16880.91万美元；出口创汇却只有2469.34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2003年引进版权12516项，输出版权仅811项，并且近10年中国版权贸易输出和引进之比大体上是1:10。

以上数据表明，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精神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在很大差距。

差距：问题在哪里？

如果深入到我国精神产品生产过程及其管理体制的内部，就会发现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这就是，**我国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对精神产品生产缺少必要的学术规范或艺术标准，导致一些生产者粗制滥造，使品位低下的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产生。**这在学术界、教育界尤其突出。例如，学术界著书不立说、撰文不立论已经成风。以教材论，我国已出版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每年产出10余部），但其中真正有质量、赢得学界瞩目的却屈指可数。哲学类教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情形也大致似此。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类教材就不下千部（每年产出30余部），但这些教材的体例结构基本上仍是艾思奇主编、1961年出版的那一部（它与前苏联19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有血缘关系），只是某些章节及话语方式有所不同。为何内容老化、低水平的教材得以重复生产？缘在它与编著者职称的评定和出版社的利益挂钩，这类教材又“容易”编写，所以低质量教材成为高产出的书种就不足为怪了。

重数量轻质量的激励机制则助长了不良学风。教师职称晋升的一项硬指标是发表作品的数量及所载刊物的级别，其学术质量反倒不去认真评估，这实质是鼓励人们去低水平重复生产。有的教师一年撰写论文几十篇，出版著作几部；未及不惑之年已收获了数百万字的成果。而学术失范则使剽窃抄袭、强占他人成果的事件屡屡发生。目前，学术泡沫越来越膨胀，全社会编书撰文已成为一种文化公害。没怎么读过书的人却要去写书，很少读书的人却写出很多的书。不光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也要发表论文，连一些政府官员、工商人士也忙此营生，以获取职业、职称双丰收。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海南省一位著名的“辞书大王”，在20多年里主编、自编词典34部，上市的字数总共超过两亿，平均每天编撰3万多字。图书质量的滥劣表明它们的作者不是在以作品的品位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钱包尽快鼓起来。

由于市场的不规范，使得伪劣作品也有了有利的生存环境。据媒体提供的资料，我国的书评带有广告性质，出版方请人写书评同图书销售有直接联系。于是出版界出钱请人写书评，只能褒不能贬。书评人的名气大小跟钱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书评专业户不仅所有的书都能评，并且不看完书也能写。网上的叫卖是：名人撰写书评，千字500元起价。1500字书评售价800元，3000字书评售价1600元。这种状况说明我国还没有成熟的书评环境，更缺乏权威的评估机构，以致不能通过严肃的书评将优秀图书留在市场、将劣质图书逐出市场。更有甚者，现在有些人善于通过媒体造出一些“大师”。可是，我们的“大师”愈多，大作却愈少。这种文饰与扭曲作用，会连续不断地制造文化的虚假繁荣。

假若我国精神产品生产不如人意的现象不能得到改观，精神产品质量普遍低下，长期下去只会导致社会精神生活的贫困。而精神贫困同样不是社会主义。从人的需求多样性来说，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样重要。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否，不仅取决于精神产品的数量，更取决于精神产品的质量。在任何时候，高品质的精神产品更具魅力，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规范我国的精神生产，转变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健全激励机制，才能使我国的精神产品在真正丰富起来的同时多出佳作精品，才能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从长远看，我国的精神产品生产要有新的发展，精神产品质量要有大的提高，先要改革精神生产管理体制，严格学术规范及相关制度，否则粗制滥造的现象将得不到禁止。例如，在科技领域，要保证有更多高质量论文的产出，就必须克服目前存在一些片面认识和做法，去单纯追求SCI论文数目，因为这无形中会鼓励一些人去做一些较小的研究项目以便容易发表论文，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义但非常艰难的科学问题。显然，学界的浮躁风气和急功近利的取向不克服，只会导致科学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使我国最终难以进入世界科技强国。

还有一种最令人忧虑的情况是，由于管理上的漏洞，我国花费了巨额科研资金却生产出了不少说服力不强的成果，甚或假成果和不是成果的成果。据有关报纸评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有关单位2004年的报告是中国已经进入“初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舆论哗然之际，2005年初春发布的报告则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程度与美国相比仍然落后100年以上。另据媒体报导，我国某大学强行开展一个本已被一些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白白浪费1亿元投资。该科研项目给申请人带来荣誉和利益，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除此以外，不良行为的广告战，竟能使医学教授写出白酒有利护肝的科学论文。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精神生产方式的革新是刻不容缓了。如果不加紧改革科研管理体制，不能尽快营造一种出文化精品和科研精品的环境，我们的精神生产不仅难以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而且极有可能发生大的滑坡。因此，**我们必须以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决心和改革的心态，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消除管理中存在的弊端，正确处理精神产品生产中量与质的辩证关系，尽快将注意的重点从精神产品的数量方面转向质量方面，这样才能迎来我国精神产品生产的真正发展和精神生活的真正丰富，才能从根本上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精神产品生产领域的差距。**

我这书是哭出来的

□邓伟志

《和谐社会笔记》一书已经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一个多月了。书名叫《和谐社会笔记》，有人问我读了哪些书？说实在的，精读加粗读，真不知读了多少百本书。记得单是一家出版社的书我就读了十好几本。可是，这笔记与其说是读出来的，不如说是跑出来的。

为了认识社会，为了提高一点社会的和谐度，我到过很多地方调查：到过十年不下滴雨的沙漠里调查牧民；在雨季，越激流，走“猴子路”，过铁索桥，到蚂蝗上树的哀牢山调查山里人；在冬天，我脚踏滑雪队员的雪橇，手扶滑雪队员的双肩，在雪山上调查少数民族。实践是写作的源泉，调查是写作的溪流。调查给了我写作的素材，调查给了我写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调查给了我写作的冲动。当我看见农民冬天只穿两件蛇皮袋时，流了泪；当我看见农民家里没有箱子、橱子，只用几根绳子挂衣服时，流了泪。当我看见拥有50年党龄的老社长（初级合作社），一只脚穿着白色运动鞋，一只脚穿着又脏又臭的破布鞋时，我问老社长：“你怎么这样穿鞋子？”老社长苦笑而不答。旁边一位调皮小伙子说：“道理很简单！你们捐的鞋子不够分的，一只鞋子分给了老社长，另一只鞋子分给了另外一个人……”我听了，难过得跑到他们的厕所里流了两次泪，镇定镇定情绪。老社长眼圈红了不让我看到，我流泪也不让老社长看到，相对无泪又有泪。

这次写《和谐社会笔记》，没有任何人向我组稿，老社长他们就是组稿人，催稿人。《和谐社会笔记》这本书没有策划人，老社长他们就是策划人。《和谐社会笔记》不是“奉命文学”，但是，又好像是在奉老社长之命写作，奉那调皮小伙子之命写作。写书时，老社长他们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是在蘸着他们的泪与汗写作啊！如果说我在调查时的流泪是人道之泪，人性之泪的话，那么在写作时就开始变同情为理性了。我是在跑出了“情”之后，才开始理出点道理的。

不过，这“理”中仍然有“情”　仍然有“泪”。只是这“情”是悲愤之情，这泪已转化为人本之泪，人文之泪。

当我看到有大块文章批判“中产阶层”时，我惊诧莫名，我楞楞地坐着，我担心：如此批判“中产阶层”会不会导致中等收入的群体变小？如果中等收入的群体变小那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阶层分布是橄榄型还是哑铃型？

当我看到我们有的媒体见“弱势群体”就“砍”时，大有一种握笔的右手被砍的感觉。“弱势群体”各国都有，中国怎么会没有呢？还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写过“弱势群体”专著，我们岂能避而不谈“弱势群体”呢？不准出现就是不予承认，不承认“弱势群体”会不会导致弱势群体增多呢？弱势群体增多了又会导致什么问题出现呢？

理论贫困比经济贫困更使人难过。社会理论的贫困与社会事业的贫困是交叉感染的。社会事业的贫困使我不敢高枕无忧，社会理论的贫困使我高枕也充满着忧。我心有忧，我手要写。我奋力为“社会平衡”论鸣锣开导。不平则鸣呀！百家争鸣呀！身为“百家”之一又怎能不起而“争鸣”呢？我在《社会科学》1991年8期上高喊“社会平衡是一门大学问”，提倡先从“广义的社会平衡”做起。后来我又在《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8期上写道：“最要紧的是制定经济投资与社会投资的合理比例，尽量提高社会事业投资，促进经济与社会在更高层次上同步前进，协调发展。”“我们要的是积极的、向上的、高难度的同步与协调。”

不料，事与愿违，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经济这条腿愈来愈长，社会这条腿愈来愈短。面对着比例失调、社会失衡、行为失范，我忧伤之极。我担心有些地方出事。有些指标超过了警戒线，超过了危险点，犹如水位高出了大堤。我不能眼看着大堤被冲决啊！有一天，写笔记时我仰天长叹：规律啊，你能饶恕我们吗？必然性啊！你会让出一条路吗？规律是无情的。必然性是势不可挡的。怎么办？我傍惶！怎么办？我呐喊！在非典爆发时，我潜心于研究作为社会事业组成部分的卫生事业。当我知道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成员国中排在144位时，我捏了一把汗，我寝食不安。后来我国人民战胜了非典，我破啼为笑。我们是在人均卫生经费只相当于非洲最穷国家的一半的情况下战胜非典的。咳！我们再一次用“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坦克”还不该放声大笑吗？

不久，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像是点到了我的穴位，激活了我的兴奋点，我一口气写了好几篇文章；当中央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时，我大有‘久旱逢甘雨’之感，雀跃三尺，浑身是劲，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又写了十几篇阐述和谐社会的文章”。（《和谐社会笔记·后记》，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3月版）

有哭，有笑，先哭后笑。哭成文章笑成书。

书出来了。书评也出了好几篇。可我并不认为书出来了，就万事大吉了……

■文化视野／传媒文化

“社会麻醉”：传播的功能失调

□胡森林

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执行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实现的。大众传播的功能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正确认识大众传播的正反两方面功能，才能营造有利于发挥其正面功能的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其消极作用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一是结构-功能学派的倾向。这一学派认为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必要的功能。具有这一理论倾向的代表性观点有：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概括的传播“三功能说”——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美国社会学家C·R·赖特提出的“四功能说”——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提供娱乐；以及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所总结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可以看出，具有结构-功能学派倾向的学者概括的是大众传播积极的社会功能，是从正面加以肯定的。

二是冲突学派的倾向。冲突学派的理论出发点是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即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状态，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大众传播功能的分析，就具有这一倾向。他们于1948年合著发表的《传播研究》一书中，着重考察了大众传播及其载体大众传媒的非正面功能，既有中性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强制规范功能”，更主要的是消极作用或者说是大众传播失调后的负功能，包括四个方面：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这四种负面作用被他们形象地命名为“社会麻醉”功能。

“社会麻醉”是典型的传播功能的失调。拉氏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他们每天在读，在看，在听，在思考，但是，他们很容易把这些活动当作现实行动的替代物。他们有兴趣，有知识，接受了众多的信息，也有关于未来的种种打算，但是，当他们听完广播，看完电视，读完报纸以后，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二战”后，西方媒介内容煽情化、浅薄化、低俗化倾向加剧，“社会麻醉”的观点在此背景下被提出。而随着大众传媒日益发达，这种现象愈加严重。针对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情形，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的大量复制”所支配的社会，大众媒介的信息潮水裹挟着广大受众，使他们丧失了对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大众传播对现代人来说成了一种“心理暴力”。

在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他们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主流媒体报刊和广播的，而到了今天，电子媒介和网络大行其道，高效率的传播能力、海量信息和广泛的普及，使这种“社会麻醉作用”有增无减。当下社会的人们在各种媒体的包围下，艰于呼吸却又乐此不疲，他们或是感觉不到媒体的“麻醉”，或是甘心被“麻醉”。他们的视线被媒介所牵引，心智空间被媒介完全占据，成为媒体操纵下的“提线木偶”；他们从媒介的虚拟空间中寻找满足感，情感和思想的起伏变化都以媒体内容为“脚本”；他们的现实欲求被不断地刺激和放大，社会行动能力却在不断降低。在《电视与美国人的性格》一书里，美国精神医学家D·格林就不无讥讽地写道，电视的煽情性和刺激性，使许多美国人退化到了只会“边看电视边吮吸手指”的地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大众传播媒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接触媒介的时间和范围都极大地增加。媒介在发挥正面影响的同时，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麻醉”的负面影响，西方学者所分析和批评的现象在中国也基本上存在。近年来我国有人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例如关于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对“网虫”和“电视的一代”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电视的一代”是指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以“跟着感觉走”为行为方式，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内心世界是孤独而封闭的，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借鉴美国社会学家D·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所指出的观点：社会性格的形成方式经过“传统引导”、“内部引导”后，到达“他人引导”的阶段。而“他人引导”很大程度上就是媒介引导，媒介引导的结果是批量生产出没有自主意识、没有人格深度的“单向度”的人。这其实就是媒体日复一日地“麻醉”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可以说，现代社会变幻不定、大起大落的各种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正是“麻醉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传媒的“社会麻醉”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它是大众传播负面作用中影响最大的。现代传媒通过市场运作，介入社会权力和影响社会制度，作用于现代人的人格和心智，如果任其“麻醉”作用泛滥，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肌体。所以，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制度的规范和文化的引导，从而尽量规避传媒可能带来的否定性社会影响。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把这些社会弊端完全归罪于媒介本身，而忽视了社会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

“塑造型”和“服务型”教育方式

□张利全

“塑造型”的教育是工业社会的教育方式：现在社会的主体还处在工业时代，工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模具制造、批量生产，就是它要讲究生产的效率，必须大批量地制造出人类所需要的东西出来，所以这种生产是统一化的大批量地生产制造，以至可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批量生产的社会。工业社会教育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追求内容和过程的确定性；第二，追求结果的标准化；第三，追求“人”的批量生产，也就是“塑造型”的教育。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原因是人们简单地服从于工业社会的要求，在教育中把人当做物一样来制造，来生产，从流水线的这一端输入进去，经过这条流水线走出来一个标准件。每一所学校就相当于一座工厂或一条生产线，其产品就是学生，而教师的作用相当于这条生产流水线上的工程师。

“服务型”教育是信息社会的教育方式：上世纪中叶人类开始使用电脑并慢慢地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共享性、开放性。信息与物质、能源的最大区别是它可以被共同占有、共同享用而原信息并不改变。教育信息化的实施，使受教育者的学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改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这种开放式的教育网络为每位国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性和人们实现终身学习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坐在家里用计算机通过网络倾听名校名师的教学、查阅世界各地图书馆的资料、在计算机上做实验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革，人必须成为学习的主体。人们学习知识，更多的是通过他们自身的认识活动学会的。由此，教育的方式要从“塑造型”向“服务型”转变，教师要为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服务——“教师是学生成长的服务者”